

05.09

鄂尔多斯 史志研究文稿

(第五册)

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

《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

编纂缘起

地方志是以特有的体例记述一定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的综合撰著。它客观地反映该地区天文、气候、地形、矿藏、动植物等方面的状况，如实地记载各族人民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诸项社会实践，从而为本地区积累历史资料，保存专项文献。

我国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有编修志书的优良传统。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地方志的内容也在不断地更新和充实。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编纂新的地方志就尤为重要。这不仅可以为本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门研究本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提供翔实的材料，而且还可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为提高干部群众的专业知识和科学文化水平，提供切合实际的乡土教材。可见，这项工作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既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当务之急，又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千秋大业。因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发出了普遍纂修地方志书的号召。

我盟位于长城以北，历来就是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相与进退的地区、北方各民族逐鹿纷争的场所。随着各民族的逐步融合，不少北方民族又相继由此叩关南下进入中原。在此期间，这里时而群雄并峙，时而政权更迭，居民的构成复杂而多变，地区的建置也不够稳定。基于这种情况，文化上各民族相互影响的印记比较明显，而前后的相承关系却若断若续，因而史料记载头绪纷纭，历史面貌扑朔迷离，一直没有一部完整的志书。十五世纪中叶，蒙古阿罗出、毛里孩等部开始进兵河套。此后鄂尔多斯部就一直在这里驻牧，历史上出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局面。但是，由于蒙古民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以及语言文字、文化传统等方面的殊异，其历史著述也仅以蒙古民族的兴起发展为源流。到了近代，虽然有志于编修伊克昭盟志者不乏其人，但也由于种种原因所致，这一历史空白始终未得填补。

十年动乱之后，大治伊始。在伊盟政协革命老干部、爱国统战人士一致倡导下，内蒙人大常委、伊盟政协副主席奇忠义同志受托主持编写《鄂尔多斯历史沿革》。奇忠义同志于一九七九年底广泛征求意见，拟定了编写纲目，并遍访各界学有专长的同志，落实了撰写任务。为了抢救从我党最早在伊盟开展革命活动到全境解放这段时期的历史资料，特约请先后在伊盟从事革命工作的高增迪、田万生、韩是今等同志撰写革命回忆录，派专人查访搜集已故的王悦丰等蒙古族干部从事民族解放事业的事迹材料，首先于一九八一年印行了《伊盟革命回忆录》第一、二辑，计四十五万余言。

编印伊盟革命回忆录和编写鄂尔多斯历史沿革，可以说是编写地方志的端倪。其规模虽然具体而微，但还是搜集到不少资料。团结了一批力量。中共伊盟盟委和伊盟行政公署对这项工作给予

了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肯定。一九八二年盟委和公署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着手地方志的编写工作，正式成立了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负责开展编修《伊克昭盟志》的各项工作。

鉴于伊盟向无志书，缺乏修志的借鉴，加之资料不易搜集，人才更加难得，总编室首先根据地方志的规模和纲目，特约我区和我盟有关专业的科学工作者，分门别类撰写专题研究文稿，作为未来盟志的基础史料。由于有中共伊盟盟委、伊盟行政公署的直接领导，又得到了自治区内和盟内各界人士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工作进展较为顺利。在总编辑奇忠义同志的亲自主持下，由《伊克昭盟志》副总编辑梁冰和特聘编辑王仁定、赵继志三同志对特约文稿进行统一修订。现将全部文稿分十册陆续印行，作为内部资料向各界广泛征求意见，希不吝赐教。

《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编辑组

一九八六年

目 录 (第五册)

《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编纂缘起.....	(1)
-----------------------	-----

伊克昭盟“独贵龙”运动概述.....	宝音编著 白歌乐翻译
--------------------	---------------

一、封建统治的衰朽和奴隶们的觉醒.....	(5)
-----------------------	-----

二、殖民者的猖獗与民族意识的萌发.....	(11)
-----------------------	------

三、武装抗垦，保卫牧场.....	(18)
------------------	------

四、高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	(40)
-------------------	------

鄂尔多斯蒙医蒙药简况.....	巴·吉格木德 编著 钢克 翻译 (78)
-----------------	-------------------------

第一章 古代部分.....	(80)
---------------	------

第二章 近现代部分.....	(87)
----------------	------

第三章 学术流派.....	(90)
---------------	------

第四章 医学教育.....	(92)
---------------	------

第五章 著名的医生和医学家.....	(94)
--------------------	------

鄂尔多斯的气候.....	王朝民、王志学 (101)
--------------	---------------

伊克昭盟“独贵龙”运动概述

宝音 编著
白歌乐 翻译

满洲贵族征服蒙古之后，伊克昭盟的广大牧民群众受着内部封建领主的压榨和异族统治者的奴役。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清王朝采取种种羁縻政策与封锁措施，笼络蒙古封建王公，防范广大牧民。十九世纪初叶前近二百年的时间里，鄂尔多斯部落及其领地一直被清王朝目为自己的“安土顺民”。

十九世纪初叶开始，清王朝的封建统治逐步走向衰落，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军备废弛的情况日见严重。鸦片战争之后，正在兴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继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廉价的工业原料，蹂躏我各族人民。丧权辱国的清朝政府，也实行更加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他们除摊派捐税徭役，掠夺土地牧场之外，还以捐输为名向内蒙以及伊盟的王公勒索银两驼马，并视其缴纳数额之多寡作为加衔晋爵之标准。持禄养交的王公贵族这时已得不到清朝政府的“赏赐”和薪俸，有的为了晋升求荣，不仅加紧了对广大牧民的层层搜刮和盘剥，甚至还不顾死活，大量出卖牧民赖以存身的草牧场。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政府对内实行独裁统治，镇压革命；对外投靠帝国主

义，出卖国家权利。比之清王朝，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掠夺与搜刮更是有增无已。各族人民被他们推进了无边的苦难深渊。

在鸦片战争前后到“五四”运动以前这将近百年的时间内，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和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使国家民族的命运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对各族人民的生存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鄂尔多斯的广大牧民在苦难中觉醒，由觉醒而奋起，他们高举“独贵龙”的旗帜，展开了持续不断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独贵龙”是鄂尔多斯牧民群众为了共同的切身利益而自由集会结社、自发起来斗争所创造的一种组织形式。最初只是进行公开的说理斗争，主要采取向王府请愿示威的方式。“独贵龙”是蒙语音译，“独贵”是环形的意思，“龙”是复数游尾。当旗政损害了广大牧民的利益，或旗府的官佐干了伤天害理的勾当时，大家激于公愤在约定的地点聚集，环坐在地上讨论斗争方案，提出革除弊政或撤办不法官佐的要求。决议通过，与会者在上面签字呈环状——既表示大家一律平等，又可以掩护发起人和领导者——然后，结队向旗府请愿。这种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虽然是自发的和散漫的，但其斗争内容却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质。“独贵龙”运动的兴起，是鄂尔多斯牧民阶级觉醒的鲜明标志。

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鄂尔多斯广大牧民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越举越高，“独贵龙”运动的规模 and 声势一次比一次更大。他们由向王爷请命，进而否定王权，向上一级衙门控告王爷的罪行，不仅要求惩处不法官佐，还敢于推举自己的代理人取代腐朽的衙门行使职权，不但敢于反对本国本民族的封建统

治者，而且还敢于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虽然“独贵龙”的成员进出自由，比较散漫，但由于逐步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领导核心，从它的骨干力量来看，已不再是时聚时散的自由组合。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他们把群众分成若干组，人数或数十或数百不等，斗争中有分有合。遭到敌人镇压时，他们能够巧妙地由公开转为隐蔽，或者勇敢地用暴力对付暴力。鄂尔多斯广大牧民在斗争中学会了斗争，提高了阶级觉悟。

可惜的是，由于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以及在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政治斗争纲领，“独贵龙”组织还没有突破民间社团的局限，“独贵龙”运动还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达到某些目的，往往就此罢手；遇到较大的挫折，不少人就自行散去。而“独贵龙”的敌人也钻这个空子，纠集一些人拼凑去。官办“独贵龙”鱼目混珠，与广大牧民为敌。正因为如此，“独贵龙”运动虽然大大动摇了封建统治，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但终究还是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与瓦解破坏下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独贵龙”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时期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为“五四”运动以后伊盟以及内蒙地区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好了必要的准备。伊盟地区地广人稀，居住极为分散，“独贵龙”运动在发动、团结、教育、组织广大牧民进行革命斗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为可贵的是它为无产阶级政党在伊盟地区开展革命斗争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培养和锻炼了一批优秀的革命骨干。“独贵龙”运动的杰出领导者旺丹尼玛和席尼喇嘛就是在斗争失败之后，四出奔走，寻求民族解放的真理，最后终于投身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怀抱，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席尼喇嘛在二十年代

全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中，带着革命的真理回到鄂尔多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指导广大牧民的革命斗争。他通过“独贵龙”的方式很快把广大牧民发动起来，在此基础上整建了“公会”，作为团结广大牧民的纽带，并着手在其中发展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武装。条件成熟之后，他就在乌审旗成功地领导了内蒙古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推翻了封建王公制度，建立了人民政权。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之后，他又实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受到了蒙汉群众的热烈拥护。

席尼喇嘛和旺丹尼玛领导的这一次牧民革命运动，是他们过去领导的“独贵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独贵龙”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的高峰，光辉的总结。但是从革命性质和历史范畴来看，从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来看，它与以前的“独贵龙”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这次革命运动虽然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随之而失败了，但是，毫无疑问，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鄂尔多斯高原上唤起的第一场风暴，是鄂尔多斯广大牧民在党的领导下举起的第一面鲜艳的红旗。

“独贵龙”运动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必将满载着蒙古族牧民的光荣与骄傲永远彪炳于鄂尔多斯的革命史册。

一、封建统治的腐朽和奴隶们的觉醒

清王朝统治蒙古，采用的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军事监督的高压方式，实行的是民族隔离和分割统治的反动政策。中央设理藩院，承旨立法，依法施政；地方设将军或都统，从军事上加以监督和节制。地区行政推行盟旗制度，实行旗界封禁，严格限制蒙汉之间的各种正常联系，严厉禁止蒙旗与蒙旗之间的自由迁徙和交互往来。伊克昭盟属绥远将军直接统辖，各旗的牧地，界限森然，任何人都不得擅自逾越。

为了缓和蒙古人民的反清情绪，清王朝仍然利用蒙古封建主来实现其对蒙古人民的统治。在削去蒙古封建主原有的汗、济农、洪台吉、太傅等封号的同时，根据他们原来地位之高低、对清廷效忠之程度和功劳之大小，分别授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等爵位，并按爵分等发给优厚的俸禄。除了高官厚禄的收买之外，还通过通婚、年班、朝觐、燕享、赐赉、优恤、赈济等措施，模糊其反满意识，消磨其争雄锐气。正是在清廷的羁縻与笼络下，蒙古封建主甘心充当藩臣，作清王朝的御用统治工具。

清朝统治者不仅沿袭了领地分封制，把蒙古旧有的社会阶级结构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且加强了蒙古封建领主剥削广大牧民的封建特权。这些封建主从清王朝那里取得了任意支配本旗土地牧场的权力，从而也就操纵了属民的游牧生活。加重了超经济的强制，使广大牧民进一步丧失了离开其领主领地的权利，治

为封建主任意驱使的奴隶。伊克昭盟各旗札萨克王公拥有三十二户至六十四户随丁，最低的四等台吉还领有四户随丁。这些牧奴是主人的“活动”资产，终身为主人服役。他们或在领主家做家务，或在自己家为主人牧放牲畜。主人可以无偿地占有他们的劳动果实，他们受着主人的随意支配。随丁以外的广大牧民，大多是阿勒巴图，即服役或纳贡之属民。他们负有供养旗札萨克及其家属的义务，又须负担封建主值年班、朝觐、进贡、会盟、移营、嫁娶等一切费用。有的封建主还要借端勒索，他们也得一一支应。此外，还负担着清廷实物税及盟旗等一切世俗政权的全部费用和供养寺庙大批喇嘛的重荷；连驿站赋役、运输劳役、供给官员及书吏的食住、寺庙的建筑和修缮费用、调遣军队的费用、盟旗偿还的债务以及清廷军人官员的给养，也都要由他们分摊。伊克昭盟各旗群众，缴纳的大批畜产品不计算在内，每年还要分摊官银二千五百两。

十九世纪初叶以来，清王朝政治腐败，盟旗各级封建主挥霍成性，穷奢极侈。他们惨无人道的暴虐统治和永无休止的残酷榨取，把鄂尔多斯广大牧民逼到了无以自存的可悲境地。广大牧民逐渐认清了统治者们的压迫剥削的反动本质和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意识到只有奋起反抗，才能维护自己生存下去的权利，于是，他们举起了“独贵龙”的大旗，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乌审旗是“独贵龙”运动的发祥地。桑杰旺钦自嘉庆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一六年）掌握乌审旗札萨克大权以来，为了满足其无厌的贪欲，在清廷规定的繁多而又苛重的贡赋之外，又滥施淫威，向广大牧民加派牲畜税、草场税、人头税和谷物、奶食等实物税。他的王府，除平时役使的放马、放羊、放牛、挤奶等奴仆外还随意征用诸多男女牧民供其驱使。春季，牧民要放弃自己的

生产，无偿地到王府为札萨克种地；秋季，牧民的妻女又要带着自己的奶牛前来王府交纳奶食。

乌审旗东都的巴音淖尔一带距离王府较近，这里的牧民深受桑杰旺钦的茶毒，已经无可忍受。道光八年（公元一八二八年），他们积蓄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广大牧民在普力杰、珠拉吉嘎、德力格尔、宝迪图门、哈吉嘎尔那木吉拉、沙格德尔等人领导下，一呼百应，潮水般拥向王府请命。平时专横骄纵的桑杰旺钦，这时却吓得惊恐万状，慌忙下令关上大门，蜷缩于深宫大院，不敢接见群众。愤怒的群众一发难收，他们列举桑杰旺钦的罪状呈词上报伊克昭盟盟长、鄂托克旗札萨克。而盟长却无视群众的抗争，根本不予理睬。他们又聚集三百多人麾而向西，包围了盟长所在的鄂托克旗王府。一直坚持了三个多月之久，盟长才迫于群众的压力，接了状纸，呈报清廷理藩院。清廷担心事态扩大，于同年革去桑杰旺钦爵职依律治罪，以其子巴达尔乎承袭了乌审旗札萨克王位。盟长也只好下令，免除了桑杰旺钦私自征收的各种赋税。群众的负担，随之稍有缓减。

巴音淖尔的群众以请命和告状的方式迫使统治阶级作出一定的让步，其结果不过是加速封建主的世袭更替而已。但是，这次斗争是见诸文字记载的第一次“独贵龙”运动。它是奴隶们觉醒的标志，是大规模群众斗争的先声。虽然未能触动整个封建统治，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封建秩序。不仅伊克昭盟的封建主为之心摇，就是在清廷的理藩院也引起不小的震动。

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支付丧权辱国的赔款，清廷加重了对人民的搜刮。同治初年，他们除贡赋之外，又向伊克昭盟各旗加征巨额税银，当时谓之“靶银”。各旗贪官污吏乘机敲诈勒索，拼命吮吸人民血汗。不堪重负的广大牧民，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

下，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接连不断地掀起“独贵龙”运动，反对王公官吏的横征暴敛和官府兵差的徭役。一八五八年，乌审旗“独贵龙”运动再度兴起。一八六六年，鄂托克旗“独贵龙”运动首次爆发。一八七九年，札萨克旗和乌审旗的“独贵龙”运动同年举事，后者影响更大。

当时，乌审旗札萨克巴达尔乎已经承袭了贝勒爵位，当了多年的盟长。他老朽昏庸，不问旗政，纵容手下官佐鱼肉民众。协理台吉图都布色楞、管旗章京拉希那木吉勒等乘势舞权弄柄，胡作非为，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广大牧民愤怒已极，组织“独贵龙”进行抗争。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封建上层也开始分化。这次运动的发起者与领导者，除了牧民伊达姆札布和通那二人外，还有胡拉格、毕力袞达赖台吉。他们集合了三百多人，包围了图都布色楞和拉希那木吉勒的住处，将这两个民愤极大的坏人拉出示众。列数其罪状之后，勒令将其盘剥侵吞之全都银两如数上缴旗札萨克衙门，并不准他们再随意增加赋税。

拉希那木吉勒不仅嗜财如命，嗜血成性，而且还是一个荒淫好色的无耻之尤。广大群众无不恨之入骨。伊达姆札布得知其与姘头厮混时，率领“独贵龙”群众，将其当场拿获，绑赴巴达尔乎王府问罪。众怒难犯，巴达尔乎只好采取敷衍手法欺骗群众，治拉希那木吉勒“放荡不法”罪，处以革职鞭笞和枷号一月的刑罚。群众一经散去，又改判为赎金处罚，不了了之。

这次“独贵龙”运动持续了五年之久，弄得盟长巴达尔乎终日惶惶，寝食不安。他一方面策划报复的阴谋，一方面呈报清廷理藩院，诬告伊达姆札布等人“聚众滋事”，请求动用武力镇压。不久，巴达尔乎一命呜呼，其子察克都尔色楞遵照乃父“遗命”，秉承清廷旨意，于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对“独贵龙”

进行突然袭击。分散的“独贵龙”组织，手无寸铁，无以自卫，以伊达姆札布为首的六十多人遭到逮捕，被投入监狱。受尽酷刑的折磨之后，伊达姆札布被发配到湖南，通那被发配往山东，他们的妻室儿女也被交给放逐站处理。毕力袞达赖台吉等受到鞭百及罚九的处置，其他人员也都分别被罚以不同头数的牲畜。

革命失败以后，参加“独贵龙”运动的群众，遭到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报复和疯狂迫害。他们赤贫如洗，无家可归，终年在饥饿和寒冷的威胁下四处流浪，用悲怆的歌声怀念自己的战友，倾吐胸中的愤懑：

南飞的天鹅划破了云天，
阵阵鸣声催我奔向湖南。
我若是有腾空飞行的翅膀，
我若是有重逢乡亲的机缘……

十九世纪末，中国封建统治的衰朽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有些内蒙古封建领主的腐化淫靡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具有反抗斗争光荣传统的乌审旗牧民，又多次燃起“独贵龙”运动的烽火，向风雨飘摇的封建统治发起猛烈的冲击。

察克都尔色楞在镇压了伊达姆札布等人领导的“独贵龙”运动之后，志得意满，变本加厉地倒行逆施。他的福晋娜仁格日勒也恣意擅权，干预旗政。她安插重用坏人，排挤正直的官佐；私生活淫荡糜烂，丑闻百出。整个王府一片乌烟瘴气。光绪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一年），乌审旗东部、王府附近珠兰敖包一带的乌力吉德札格尔台吉，发动群众组织“独贵龙”，控告察克都尔色楞夫妇的罪恶和秽行。运动未及开展起来，就遭到察克都尔色楞的武装镇压而夭折了，乌力吉德札格尔被削去了台吉的爵位。

从此，察克都尔色楞意气更加骄纵，不可一世。他和福晋不仅生活奢侈糜费，用度惊人，而且追求权势的欲望也越来越大。他一心想爬上盟长的宝座，娜仁格日勒一心想取得“诰命夫人”的头衔。他们的安富尊荣只能用广大牧民的血汗去换取。因此，他们不顾牧民的死活，肆意加派名目繁多的赋税，还出卖牧场捞取大量地价银。此外，当时贿赂公行，卖官鬻爵成风，他们还以全旗土地人畜为抵押，向外省富贾借了大量高利贷，用以行贿送礼，活动关节。不久，“诰命夫人”的封号到手，“西拉哈屯”

（蒙语，意为黄毛狐狸精）娜仁格日勒有恃无恐，变得更加放纵，更加恶毒。她一方面与她的姘头、王府总管额尔德尼仓狼狈为奸，一方面丧心病狂地毒打奴仆，甚至用烧红的铁钎烫他们的皮肉。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为了反对察克都尔色楞夫妇的暴虐统治，乌审旗西部地区的群众，在牧民拉格巴扎木苏、阿勒坦敖其尔的领导下率先举起“独贵龙”的义旗，全旗各地牧民闻风响应，很快便发展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独贵龙”人众从四面八方拥向王府，冲进旗衙门，直面揭露察克都尔色楞夫妇所犯的罪行。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察克都尔色楞夫妇镇压了拉格巴扎木苏和阿勒坦敖其尔领导的“独贵龙”运动，更加疯狂地剥削和压迫广大群众。他们重用狡猾狠毒的“烂眼边”图布信，无辜将为人耿直的图银、拉格巴拉森等人逮捕入狱，进行严刑拷打。光绪二十七年（公元一九〇一年），乌审旗西部四个参领的台吉、平民和喇嘛等僧俗民众，在沙尔力格庙聚会，控诉察克都尔色楞破坏本旗各项规章、滥肆摊派苛税、私自出卖土地等罪行，并上告盟长衙门和清廷理藩院。在群众正义行动的感召下，旗衙门的部分仕官站到了民众一边，旗协理台吉却都敖其尔也支

持这次“独贵龙”运动。后来，运动失败，却都敖其尔遭到察克都尔色楞的打击与陷害。

鸦片战争前后到十九世纪末期，“独贵龙”运动连续爆发，成为鄂尔多斯蒙古族牧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一种新形式。它虽然在清朝政府和封建王公的镇压下接连失败了，但它却不断推动着伊克昭盟蒙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

二、殖民者的猖獗与民族意识的萌发

鸦片战争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的深入，异国殖民者的活动越来越猖獗；随着我国殖民地化的加深，各族人民受到的压迫和剥削越来越惨重。面对内外交迫的严重情况，蒙族人民群众在义和团爱国运动的影响下，挺身而出，与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一道投入了反帝斗争的洪流，狠狠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及其侵略活动。

帝国主义分子一直把宗教活动作为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在内蒙古进行活动，公元一八六五年，罗马教廷决定专门设立蒙古教区。同年十二月，比利时神甫南怀仁率领首批来华的“圣母圣心会”传教团十五名成员，到了内蒙古察哈尔西湾子，接替法国传教士进行宗教活动。在此后短短的时间内，他们的势力就扩展到内蒙古西部的土默特、河套、鄂尔多斯以及陕北的三边一带。公元一八七四年至一八七五年间，蒙古教区比利时神甫巴耆贤，指派“圣母圣心会”部分传教士先后来到鄂尔多斯，在鄂托克旗的城川、柳

贵乡，准格尔旗的阿驾马梁以及靠近鄂尔多斯的陕北宁条梁的小桥畔等地，开始修建教堂。到公元一九〇〇年时，外国教堂已遍及鄂尔多斯各地。城川、堆子梁、海流图、宁条梁、阿驾马梁，以及达拉特旗的大淖、小淖、古尔班扎棍和杭锦旗杭盖的三个巴嘎等地的教堂，成了帝国主义分子以传教为名扩展侵略势力、进行侵略活动的据点，严重损害了我国主权。

为了扩大影响，外国传教士先是采用救济财物、施舍医药、放赈渡荒等所谓“慈善”手段欺骗群众，裹胁群众入教。继而又勾结封建上层，收罗地痞、流氓充当打手。由于有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作护身符，他们强行租借土地修建教堂，并进行无理讹诈，霸占了教堂周围的良田和牧场，用以收租放垦。杭锦旗某官员的坐骑吃了教堂地几棵青苗，西南蒙古教区神甫闵玉清就强租了杭锦旗的一块河套地。一个精神病患者进了小桥畔教堂，闵玉清又从鄂托克旗札萨克手里诈去了一块土地。乌审旗牧民达木林养的牧犬被传教士袁史田岗保镖打死，达木林一怒之下与袁扭打起来，揪掉袁的几根胡须，教会硬行占去三岔河畔一块肥美的牧场，算作赔偿几根胡须的代价。教会兼并了大量的土地，牧民被逼得离乡背井，远走他乡，耕种教堂土地的佃农或教民，受着极其惨重的剥削。当时，耕作粗放，产量低微，按教会规定的三七、四六交了地租，他们已所剩无几，无法度日。入教的农民，除了地租以外，还要向教会交纳名目繁多的实物税捐。城川教堂向教民征收的税捐就达十三种之多。

由于清朝政府投降卖国，地方封建衙门为虎作伥，外国传教士们便更加有恃无恐。他们以教会为保护伞，包揽诉讼，隐匿作恶的奸宄、纵容坏人肆虐；私立法度、私设公堂，任意践踏我主权，鱼肉我百姓。他们规定：杀死一个外国传教士赔银万两，杀死一